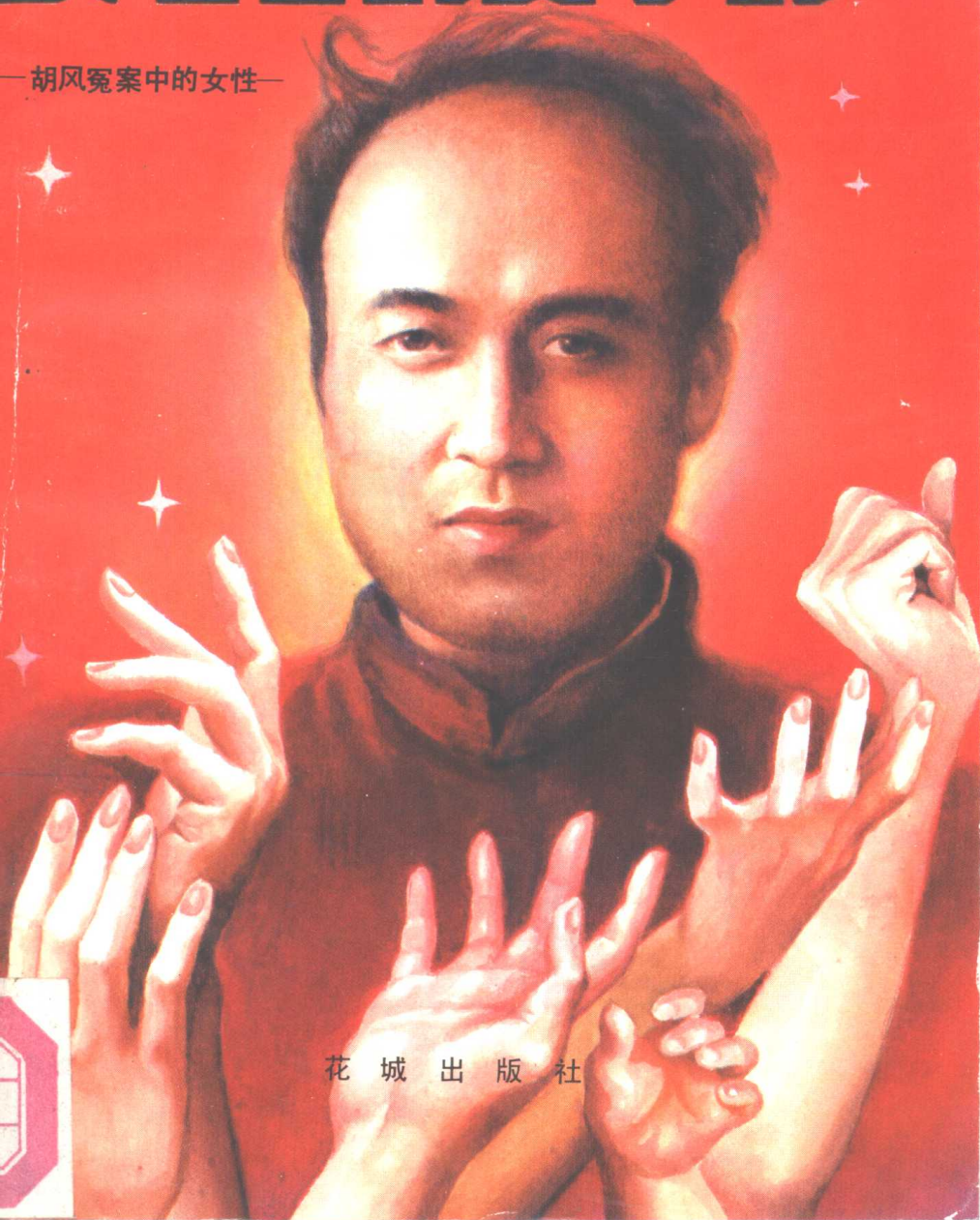


受难者的妻子们

—胡风冤案中的女性—



花城出版社

受难者的妻子们

——胡风冤案中的女性们——

筱 敏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经销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7.25印张1插页1404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5360—0715—9/I·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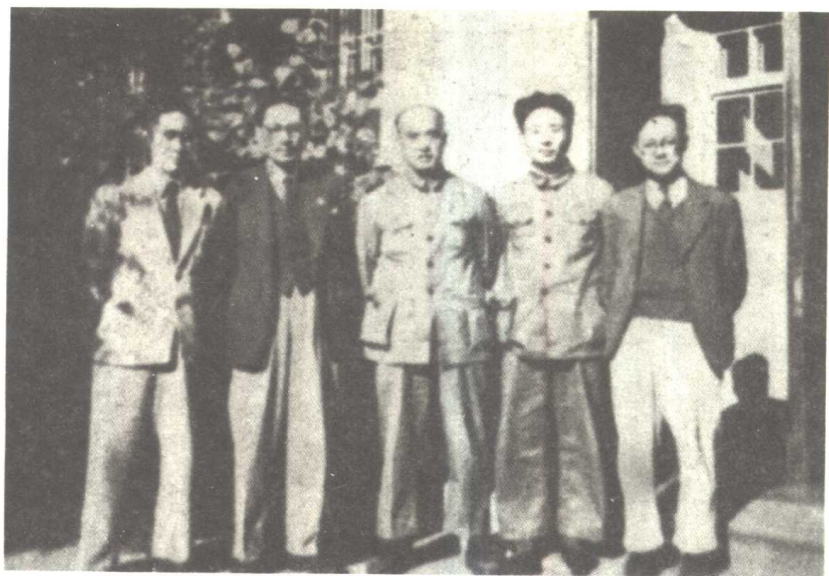
定价：3.20元

内 容 介 绍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发生在1955年的一次震动中外的大冤案。

这次冤案，除了不少著名作家、诗人、学者遭到直接打击以外，还牵连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尤为不幸的是“胡风骨干分子”的妻子们。她们在自己的亲人一旦罹难的时候，或者主动承担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或者无力承受而灵魂扭曲、内心分裂，以致奔向死亡……

作者是一位女记者，本书是她带着录音机和笔记本，采访了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京等地的数十名受难者的妻子，然后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全书披露了许多关于胡风冤案中的女性们所遭受到的种种残酷迫害的第一手材料，以真实的力量，撼入心魄！



1949年9月26日胡风与马思聪、史东山、
艾青、巴金在北京华文学校



1940年胡风与梅志、晓风、晓谷在北碚

作者：路 莘

责编：林贤治

封面：康怀宇

书号：ISBN 7-5360-0715-9/I·650

定价：3.20元



目 录

- 在我的眼界里（前记）……………（ 1 ）
- 在期待申诉的漫长岁月里……………（ 19 ）
- 梅 志
- 她俩参与抄写过“三十万言书”……………（ 54 ）
- 李嘉陵 卢 玉
- 叹息中有多少人生的沉重……………（ 80 ）
- 余明英
- 记得吗？在那些日子里……………（ 108 ）
- 罗 惠
- “与牛汉划不清界限”……………（ 130 ）
- 吴 平
- 活着的死去的都有着不幸……………（ 140 ）
- 任 敏 王 皓
- 西北高原上有她们苦难的记忆……………（ 164 ）
- 杨友梅 韦鸣震 吴仲华
- 不同的离离，不同的命运……………（ 182 ）
- 鲁开仙 王曼恬 章茵子
- 是妻子也是母亲却要割舍其中一份爱……………（ 203 ）
- 殷蓉仙

在我的眼界里

(前记)

I

胡风的名字已经不陌生了。作为一个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为文学界人士和他的读者所熟悉似乎是并不奇怪的，然而，更多的人知道胡风并不是因为他的诗作或理论著作，而是因为，他的名字联系着一个曾经震动全国的大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胡风为“头目”，又以“骨干分子”、“一般分子”、“影响分子”等各种名目株连到成千上万人。这个案子从确定到是非澄清，经历了33年。历史以许多人的生与艺术生命的挫折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无法形容的悲喜剧。

曾经有一位被年轻人称为“老师”的出版社编辑和我谈起过路翎。

“你看过《财主底儿女们》没有？”他问。

“还没看完。”我说。

“听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是否是这样？”

我不敢妄加评断，因此只能建议他去看。

我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注着“名著”字样的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我对这部名著十分陌生，在我读过的几部现代文学史中似乎都没提到过中国有这样一部“名著”。如果不是随作者的平反而得以重印，也许众多的读者也就不知道中国在四十年代曾经有过这部小说，更不知道这部巨著的作者路翎是才华绚烂的作家。然而，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胡风案件”的牵连，路翎在强大的压抑下精神失常了。到1987年，人们从他的精神疾病好转时候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钢琴学生》，已经看不到他从前作品中那种深切感受人物的心灵和与人物共命运的激情了。

在南方城市，我有幸认识了一位作家H。他五十多岁了，但仍然精力充沛。第一次见面，就听他讲了他那段被当成“胡风分子”的经历：“1955年，我还是二十出头的副刊编辑，因为读了几篇胡风的文章和七月派诗人的诗，于是就被定成了‘胡风分子’。……说起来倒真惭愧了，直到今天，我对胡风文艺思想也并没有多少了解。”如果说胡风是“思想罪”的话，那么，这位H先生应当说是“读书罪”或“求知罪”。爱好读书、爱好文学给他带来了“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两次灾难，以至于蹲了六年的监狱和劳改队，在铁窗下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好的时光。然而，这倒相反地深化了他原来的文学追求，他成了一名作家了。

“胡风集团”、“胡风分子”，使许多南北远隔，

互不相识的人的命运奇妙地联系在一起。

按照H的情形，充其量大概只算个“影响分子”。他不认识胡风和“胡风集团”的“黑干将”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曾与他们有一次书信往来。这该算是他的幸运。而在由于各种原因受到株连的人中，有的是因为与胡风本人或“骨干分子”们谈过话，哪怕是几分钟；或通过一封信，哪怕只几个字；有的是与他们曾相识，哪怕已多年不见、断了联系。这些人中有许多人非但还不像H那样读过胡风的文章和七月派诗人的诗，甚至还不知道“七月”派是什么含义。但他们同样也遭到了审查、批判、关押等不同的待遇。当然，这些轻重不同的伤害，与胡风以及“骨干分子”们所受到的伤害无法相比。

我没有见过胡风，只是在照片上看到了这个大脑袋者的形象。我不由感到疑虑，从这个大脑袋里究竟产生了一些什么思想超出了他“应该”恪守的“规范”，并因此必须遭受25年屈辱和灾难的惩罚？我从像片里他显然已经苍老但眼神依旧炯然的脸上看到了他未曾被磨去的自信和坚定，还有一份天真。这恐怕就是他不能避免厄运的一分原因吧。

汇集和精摘了“胡风分子”们的通信作为“材料”再加上“按语”的小册子，只不过几万字的篇幅。把它放上书架都未必能引人注目。然而，正是它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

据说已有人建议将这些作为“反革命罪证”的信件以它们原来完整的真实的面目公布于众。这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吧。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里都规定受到保护的通信自由的往来信件，被抄家取走或命令上交，直到写这些信的人终于得到了平反以后，它们才终于得以结束任人歪曲的命运。人民有权了解事情的真相。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发生在1955年，而在此一年前，1954年，刚刚成立了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颁布了《宪法》，其中明确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

不幸与苦难，都已经成为历史了。九年前，1980年，被定名了25年的冤案得以平反，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人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开始了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又重返文坛。

不幸的一切应当认为已经过去了。常常有人习惯地把“平反”叫做“第二次生命”。因此，对于25年后获得“再生”的人是应当为之庆贺的。但生命毕竟只有一次，在所谓“第一次”与第二次”之间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是它被摧残被剥夺了。这种摧残和剥夺所造成的损失是很难用什么尺度来衡量的。历史在这些消失了25年之后又重返文坛的人身上留下的记录，不仅是形象的过早苍老，还有心灵深处深重的创伤。

在得到平反五年后，曾经被定为那个“反革命集团头头”的胡风离开了人间。在他弥留之际，他给他正要

报考大学的外孙留下一个期望：不要报考文科。这使当时报道这个消息的记者也不免在他的文字中流露出了感叹之情。如果这仅仅作为一个家长对于后辈将来所从事的工作的期望，或许是不会引起人们的惊异的。然而，胡风，作为一个一生为文学奋斗又为文学受难的诗人、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但他却不希望他的后代继续走他的文学的路。这留给人们的当然不仅仅是遗憾。

而有这种心情的人不仅仅是胡风。

1986年底，我不知在一种什么样的神奇的魅力鼓舞下，竟然决心要去报考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为此我专程去拜访了一位曾经也是“胡风分子”的中文系教授。当他知道了我的意图之后，以他对于年轻人所固有的热情不厌其烦地对我谈了一些文学问题。但是，最后，他像是玩笑又像是规劝地对我说：“我都想改行，你又何必到这个圈子里来呢？还是搞你的机械工程吧。”

并不需要太多地去推测他们产生这种心理的矛盾的原因。“株连”的含义会使任何一个心灵坚强的人变得犹豫甚至软弱。一个有着崇高信仰的人可以以自己的生命承担由于信仰所遭到的磨难，但如果有无辜者与自己一起被钉上十字架，那么他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心灵上都将被压上痛苦的重负。胡风在十多年的单独监禁生活中一直保持了思维的清醒，但他终于患了精神分裂症，因为他闻知了“胡案”并不是仅仅联系着他胡风和那些

“骨干分子”们，还株连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兄弟，株连了他们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株连了仅仅读过他们的作品而表示喜爱的读者。投射在这些人身上的阴影直到冤案终结之后甚至依旧存在。

1987年春天，我出差到南京航空学院，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一部中型工具书的编纂计划讨论会。

会后，我和作为工具书编写人之一的南航的副教授一起离开会场。在她回宿舍而我回旅馆的途中，我无意中提到当时该校直升机专业的副教授张晓谷，我随口说道，不知他在不在学校，因受人之托，我想去看望他。

倒是因此知道，张晓谷副教授去了北京。我也就不必去找他了。

但却想不到，和我说话的这位副教授紧接着放慢了她推自行车的速度，侧过脸以异样的神情望着我低声地说：“他……胡风的儿子。”

“是的，我知道。”

对话没有再继续下去。然而，那位副教授当时带着疑问的眼神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似乎是，作为“胡风的儿子”的张晓谷给作为直升机专业副教授的张晓谷多少蒙上了一层与众不同的色彩。

那次没见到张晓谷或许倒直是个遗憾，因为在这以后，我见到过胡风夫人梅志和胡风的另外两个子女，却至今没有见到过胡风的大儿子张晓谷。但我认识不少工程学科方面的教授，其中也有在南京航空学院执教的教

授，我想，张晓谷并不会比这些教授们多一层神秘的色彩。

相似的故事不久又发生。

也在1987年。暮秋时节，正当我因“个人问题”而备受冷眼时，我的一位同学和她的父母、兄嫂与世俗相背，给予我支持和关怀。他们特别邀请我去吃饭。晚餐上，我的这位同学的被称为“乐坛新秀”的哥哥问我：

“郑先生受到监禁迫害是因为什么？”

“因为‘胡风案件’，他被囚禁将近十一年。”我说。接着我问他，是否知道“胡风案件”。

“不大清楚。不过，我知道，与胡风有关的人都很可怕。”

可怕？与胡风有关的人？我不由有些困惑。如果从一个冤案经历了二十五年才得以终结这一点来说，“胡风案件”是让人想起来有些可怕的。但“可怕”的应当是冤案本身，而不是蒙受冤屈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以及他们的亲人与朋友。

如果说三十多年前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和“声讨”曾经扭曲了胡风以及他的朋友和亲人的真实面目的话，那么，今天，没有理由再在他们的身上蒙上阴影。

“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分子”只是冤案的记录，而不是现实的存在。

“胡风分子”、“胡风分子家属”，他们和别人一样是国家的公民，他们只是普通人也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在

中间。他们是作家、诗人、教授、职员、女工甚至家庭妇女，他们不再是“胡风分子”，也不因为与胡风有关而“可怕”。

应当说，1980年，“胡风案件”的政治平反已使在此案中蒙冤的人被剥夺的公民权利得到恢复，而1985、1988年的两次进一步又进一步的平反，则确认了胡风作为一个作家应当得到完全的尊重和公正的评价。

在1980年政治平反八年后，胡风得到全面的平反。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中央再次下达文件，进一步为胡风全面平反，包括对他的文艺思想也作出了新的评价。”建国以来，尤其是1988年之后，胡风文艺思想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大概这还是第一次。

人们可以赶走内心的阴影来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重新评价“胡案”中受到牵连的作家的作品。尽管那平反“不是从负极跳到正极”（报上报道有人这样说）的暗示好比一层未散的乌云，但什么是正极和负极，却是首先可以讨论的了。

其实，既是学术问题，就难先定下正极或负极。不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学术上作什么样的讨论，不论对“胡风分子”们的作品有什么争议，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隐没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是不完整的，因此也是有损于文学史的价值。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扭曲历史的面目和减损它的光彩。改革，开放，

使我们这个封闭的东方之国打开了与世界各国相通的窗户，青年一代中众多的人不仅了解法国的巴尔扎克和萨特，也知道了有着优秀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苏联既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日瓦戈医生》。那么，他们更应该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有鲁迅、巴金，还有胡风、路翎等等。开放，不仅仅意味着了解外国，还更应当了解自己的国家的历史。

“胡风案件”已成为历史。

“让后人去评说吧”，这往往成为淡忘历史的理由。倘若每一代人都期待后人去评说，那么，历史也就永远无人评说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理由把这责任推给“后人”。

这也许就是我为这本书的因由吧。

I

所有这本书中所介绍的女性都算不上什么“名女人”，她们只是一群不幸者。她们之所以同时成为这本书的主角，是因为她们以及她们的丈夫曾经是同一冤案的受害者。

也就像“胡风分子”中很多人原并不认识，只因为成了“同案犯”才被联系在一起一样，“胡风分子”的妻子原来也并不都互相认识，她们原来从事着各种不同的工作：职员、女工、编辑、教师……

她们有着各自的家庭。

她们地位不同，性格不同，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

然而，当1955年，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开始之后，她们唯一的一点相同即同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分子家属”，把她们纳进了同一命运的轨道。

不管是分离还是相依在一起，妻子和丈夫都同时开始了不幸。梅志、罗惠、任敏……都先后经历了监禁、劳改等“惩罚”性的遭遇。

也许还有一些别的理由，但她们之所以不幸，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们是与丈夫“划不清界限”的“胡风反革命分子家属”。

失去自由而又得以恢复自由的梅志终于见到了狱中的胡风并在此后陪伴他度过了漫长的无自由的生活。她看到了在厄运前依然认真执著的胡风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她经历过饱受折磨的胡风在精神受伤后那令人悲凉和忧虑的日子。然而，在这个坚强的女性的心中，最难忘的痛苦恐怕还不是胡风活着时的生活，而是胡风亡故后在冰库中寂寞躺着的日子。沉睡而去的人是已经超脱了尘世，他也就不再欢欣或苦痛了，而那几十个日日夜夜，被冰凉的却是活着的人的心。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有一位文友曾经这样说到梅志。

这是对她的敬重和称颂，但我却有点悲哀。如果没

有这场悲剧。她将创作出多少美好的、真挚的童话诗歌献给儿童世界和大人世界。人为什么要饱受不应饱受的不幸去得到这样的称颂呢？

但对于文友的评价，她应是当之无愧的。

有一次见到贾植芳的妻子任敏的时候，又提到了那些酸辛的往事。这位被人一眼就可以从形象上看出饱经风霜的妇女几乎是淡淡然地说了一句我一直忘不了的话：“我就是想看个结果。”这大概就是她被遣送回乡“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里忍受一切折磨的精神力量吧。

其实，受难而坚强地活着的人都在等着看个结果。但在等待中的命运是人各不同。

杨志梅，罗洛的妻子。在到处都在大张旗鼓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她是一个二十刚过的姑娘。她与“胡案”无关。然而，丘比特的箭偏偏把她与一名“胡案犯”联串在一起。在团籍与爱人之间，她选择了后者；1958年又随罗洛“发配”到青海。西北高原的艰难生活几乎夺走她的生命……

同样，吴仲华、韦鸣震也被“流放到西北高原，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罗惠、吴平都曾无辜遭受暴力。也都在绝望的时候因割舍不下母子的依恋而坚持生活了下来。

而余明英、李嘉陵因为丈夫的精神失常而比别人承受了更大的痛苦。还有殷蓉仙，她在苦难的岁月里又失去了儿子、母亲和弟弟。而他们的死都与“胡风案件”